

◀ (上接4版)

庙主建筑考察。昨天已经对整体大致有个了解,今天就从残存的南门入手。吸取前两天的教训,不能只拍照等回去再细研究,而是一边细看一边拍照。此处入口从其上的王名可以看出显然是神庙较早的建筑,王名告诉我们该庙门属于第十二王朝第二位法老辛瓦色瑞特一世,因为其登基名是𓎡𓏏𓏏𓏏。这又将该遗址的历史向前推了四百年,就是说,孟图神庙群于公元前一千九百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了,也就是说,这是四千多年前的建筑。除了发现石壁上辛瓦色瑞特一世的出生名王名圈外,此处发现的这位法老的出生名却并不是𓎡𓏏𓏏𓏏,而是不熟悉的王名圈。回来查找登基名还有谁叫𓎡𓏏𓏏𓏏,发现该王名属于古埃及第三十王朝法老内克塔内布一世。这向前推出的四百多年看来还得减回来,教训是:以为知道却未经过验证的未必就是对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该门西侧有一堆石头排放整齐,上下三层,应该也是法国人或者是埃及人留下的。显然像那四排残石断柱一样有待整理研究铭文采集。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虽摆放整齐却无序的残石上发现了王名圈,居然读作𓎡𓏏𓏏𓏏,太像第六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名字了。如果的确如此,这次真的会把孟图神庙建筑群的历史向前推上五六百年了。但高伟却说,这是晚王国时期的一位女祭司的名字。虽然在王名圈里,但其上有字样𓎡𓏏,意为“敬神者”,显然高伟是对的。这个头衔往往为“阿蒙神妻”所拥有,而阿蒙神妻从新王国开始多为法老的女儿担任,神高兴与否全仰仗阿蒙神妻之所为,她常以手执叉铃的形象出现,因此又被称之为“神之歌者”,地位非常之高,因此又有“神之手”的称呼。那么,这个被称作尼托克丽丝的女人就应该是第二十六王朝普萨美提克一世法老的女儿了。这个主要献祭孟图神的神庙建筑群显然在两千年前一直被法老们所重视,各朝各代都在建设。无论是大殿还是小厅,各个法老都一直在添加修筑。有学者推测,新王国时期,在首都底比斯居住的阿蒙神祭司就超过五万之众。神的居所,人的居所;人供奉着神,神供奉着人,谁知道谁是因谁是果。



从“中世纪的墙”说起

——当孤芳自赏成为一种智识风格

编译/陈瑜

资料图片

在作者看来,人文学者们讨论时事问题时,常常落于文字、纠缠细节、拒绝比喻。如美国一众学者最近深深纠结于“中世纪的墙”这一比喻,恰恰犯了海登·怀特最想要抵制的那种错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让历史及其他一切叙事话语生动起来的,其真正是譬喻说理的“喻”。

在 美墨边境建墙来隔离非法入境的移民,是一种“中世纪的解决方案”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反正是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他们说墙是中世纪的。好吧,轮子也是如此。你们知道吗,有些东西是有用的。轮子有用,隔离墙也有用。过去它有用,现在它依然有用。”今年1月访问美国南部边境时他这样说。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如2020年想要竞选总统的参议员 Senator Kamala Harris,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中世纪面子工程”。不过,学术界的反应是把两头都骂了一通。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Matthew Gabriele 写道:“‘中世纪’的墙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实际上欧洲中世纪的墙起的作用根本不是像特朗普所想象的那样。”(《华盛顿邮报》)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David M. Perry 坚称“墙不是中世纪的”(CNN 网站)。波士顿大学 Eric Weiskott 则试图以中世纪文学教授的身份告诫读者,“把你喜欢的东西称为‘中世纪的’是不准确的、无益的”(Vox 网站)。

这一系列学界回应纵然十分迅速,却又着实令人难堪——纽约州立大学的 Sam Fallon 却这么认为。他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提出,当讨论这么一项以如此多人命运为赌注的政治斗争时,纠结于墙是否“中世纪”的象征,这么说是否构成对中世纪的侮辱,似乎完全没踩在点上。当然,学者们对“建墙”这一提案的愤怒和回应热潮完全可预见。只是,在他们这种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文本主义”(literalism)中,所体现出的是这样一种逐渐渗透至人文学者公共写作的风格:将专业知识等同于权威,将历史事实当作时事问题的决定性解答,无论这些事实本身多么微不足道或充满争议。

简言之,这些学问用错了地方。Fallon 认为,这种完全落于文字的“文本主义”是一种糟糕的修辞,它将严肃的论争降为细枝末节的讨论;这也是一种糟糕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拼死拼活赢来的对人类过去的解释权,却被“文本主义”完全背弃了。

强 调启蒙史学在发明“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些概念范畴时的作用;认为关于“中世纪黑暗而落后”的想法,源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己相对于前任的高度评价——Weiskott 的这种反思,实际上都建立在20世纪人文学科取得的一项重要洞见之上:不存在未经加工的历史,对过去的理解需要叙述者来写就。这是20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成就之一,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所论证的;还有米歇尔·福柯,以及去年刚刚去世的伟大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对怀特而言,历史意义是通过历史的叙事形式才得以彰显的:“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为它们说话,代表它们说话,把过去的片段塑造成一个整体,其整合性……纯粹是话语性的。”

但是,当“中世纪的墙”这一比喻被严肃地当作关于中世纪的历史事实来深究,恰恰犯了海登·怀特最想要抵制的那种错误:他们将事实和比喻混淆了。这些学者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让历史及其他一切叙事话语生动起来的,其实是比喻(如解经时的譬喻说理)。怀特认为,“将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同其他平庸之辈区分开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语言的敏感性,也就是对包括隐喻、转喻、提喻、讽刺在内的那些替代性的语言规范的敏感性。”而这种可贵的“敏感

性”,今天变得越来越稀有。

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生们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阅读阿多诺、福柯,而且即便他们错过了怀特,也会从其他地方间接吸收他的观点。因此,Fallon 觉得,奇怪的是,明明人文学者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历史写作塑造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过去,但当他们在选择一种参与公共话语的途径时,仍会转向“文本主义”。

还可以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特朗普将他的批判者称为“女巫审判”的习惯。“今天这个术语的复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比喻用错了:‘女巫审判’指的是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但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面临的指控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尽管总是被他们驳回。”克莱门森大学的 Jonathan Beecher Field 解释说(《波士顿评论》)。对此,人们可能会回应,由于特朗普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要把所有不利于他的证据都当作是莫须有的,所以这个比喻用得其实非常准确。不过,Field 的问题显然不止于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用事实去验证比喻。在为“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受害人恢复名誉时,这样做并没有错;但是拿它来解释一向随心所欲满嘴谎言的特朗普,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需 要思考的是这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文本主义”成了人文学者们参与公共讨论时的主流声音?人们很容易责怪环境,以及教授们在面对非学术读者时所进入的媒体生态,它们似乎成了造就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社交媒体的字数限制使得那些简明扼要的“小事实”更为流行;相反地,由一个话题引发的源源不断的跟帖,更容易把话语上的论证最后变成了资料

堆砌。又或许,学术上的“文本主义”通常被那些主流期刊拒之门外,这让部分学者不得不寻找其他媒介发声……Vox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一开始设立的目标是想要“解释新闻”,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兼具真诚而高高在上的正义感,以及一种自鸣得意的书生气。

但 Fallon 认为,真正的答案可能藏在别处——来自人文主义者的焦虑情绪,而这种焦虑源于他们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大学和公众边缘化的处境。在美国,特朗普掌权下的“紧缩政策”几乎关闭了人文学科的学术就业市场,大学里对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总称)领域基础学科的偏爱令他们愤愤不平,政治辩论中来自对手的反击让他们精疲力尽。在这样的形势下,又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历史学家和文学教授们仍在坚持自己已经被撕成碎片的权威呢?毫无疑问,在这些“碎片”中,拥有专家知识是一种资本,而最现成的流通货币则是那些“口袋装”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本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在坚持事实本身,不如说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展现——用来提醒人们,身为教授仍然是有价值的。如密歇根大学 Benjamin Palloff 的反击:“如果人们对你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那就让他们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它所代表的这项工作是长期的、困难的,以及,是的,‘精英的’。”可是,专业知识即便来之不易、或未受到公正对待,也不应该堕落至一种迂腐的学术孤芳自赏。这种“孤芳自赏”就像讨论“茴香的‘茴’有几种写法”一样,沉闷又空洞。

[编译自 Sam Fallon (纽约州立大学)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的文章“The Rise of the Pedantic Professor”]